

一、高沙馆得名于郡名

《方輿胜览》卷四十六，高邮军，郡名“高沙。有高沙馆”。《舆地纪胜》卷四十三，“高邮军，同下州，高沙郡。”高邮宋代为军，高沙为其郡名。

高邮乃汉代古县，南朝萧梁时期，高邮“置广业郡，寻以有嘉禾为神农郡。”隋初废郡为县，李唐沿袭之。宋人厘古，却未取其旧时的郡名。《说文解字》段注引大雅传曰：“沙，水旁也。”文天祥《发高沙》云，“晓发高沙卧一航，平沙漠漠水茫茫。”自高邮沿水路奔通州，一路穿行在平原水网地区。“平沙漠漠水茫茫”，就是这种景象的写照，“平沙”即为水旁之地。清人刘文淇在《扬州水道记》一书中指出：“凡濒江濒湖之地，皆谓之沙。”真州之有白沙镇，通州之有金沙镇，皆一时之名镇，是为沿江之地。

就字面意义而论，与之相对应的，高沙则是水旁的高地。高邮之得名，原本就是因为“筑高台，置邮亭”。康熙《高邮州志》卷之一称，“高邮始于秦，故称秦邮，居水中，形如覆釜。”高邮城傍湖临河，减水边之高地也。因此，高邮之有高沙郡名，无论是基于历史的传承，还是因之于地势水情，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其实，平白一点说，高沙郡名本质上就是高邮军的别名。高沙既可以指称郡城，也可以涵盖郡境内的全部地域，还可以代名郡内的建筑设施。显然，高沙馆是因为高沙郡的郡名而来。今天，高邮城东北的高沙园小区，亦是如此。

二、何为高沙馆

《舆地纪胜》卷四十三，“高沙馆，即国信监司之行衙。”说文云，“馆，客舍也。”高沙馆为行衙，乃大吏出行在外的办公之所。宋代各路转运使（漕司）、提点刑狱（宪司）、提举常平（仓司），皆有监察辖区官吏之责。《宋史》中无有行衙的记载。嘉定《赤城志》卷三，“天台馆，在州南一百三十步，俗名行衙。”王象之《舆地纪胜》成书于嘉定、宝庆间，与《赤城志》相当，故其笔下的高沙馆当为正式名称，行衙则与天台馆一样，为其通称或俗名。

赵宋王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察，规定监司官要在一年(或二年)内，巡察所辖地区一遍。哲宗元祐五年(1090)，诏“转运、提刑司按部，二年一周”。徽宗宣和四年(1122)，定“诸转运，提点刑狱，岁以所部州县量地远近互分定，岁终巡遍。提点刑狱仍二年，提举常平一年一遍。”监司的责任和权力，“朝廷外置监司以为耳目之官，提振纲纪。天下官吏有贪墨而不廉者，有违越而无操者，有残毒而害民者，有偷惰而地职者，一切使之检察其实以闻，朝廷所赖以广聪明于天下而行度黜”。

监司一方面要遵制巡行，不得“端坐本司”，但亦不得“故留诸郡”。为了防止监司官利用出差之机，勾结地方势力，“巡历所至，不得过三日，有事故不得过半月。”故而，行衙就成了府、州、军、监备而候用的一个处所。高沙馆，正是这种性质的行衙。

南宋时期，高沙馆本责之外，又兼了外事接待任务。纵观古代中国，中原王朝和周边各族的关系，多是朝贡体系内居高临下的关系。两宋则不然，宋辽之间、宋金之间可视为兄弟之邦，是一种比较对等的外交关系。宋廷置有国信所，专门负责外交事务。每逢元旦、新皇帝即位、皇帝和太后的生辰或丧事等吉庆丧哀之时，双方都要派使节前往。使节往来，沿途的接待任务基本上由地方上承办，国信所主要负责指导与督办。“国信一路郡县驿亭陈设什物……诏自京令国信所，缘路委监司一员先事点检完治。”“更不自京差内官并祇应人等，只委本处令佐管勾排办，令府界提点司官提举点检。”绍兴和议后，宋金以淮水为界，高邮处在宋金使节出行的重要通道上。绍兴十三年(1143)，金国使节前来自贺皇帝正旦，国信所差使臣三员沿路赐御筵，“一员于平江府排办，一员于镇江府排办，一员于盱眙军排办”。无疑问的，高沙馆亦有这样的外事接待任务和相应的接待能力。《舆地纪胜》言其“国信”，指的就是这种对外事务。

战争与非常时期，高沙馆尚另有派用。建炎二年(1128)正月，高宗驻蹕扬州，“移扬州宗室于泰州、高邮军”。“高沙馆比较完备的设施与功能，自然是安顿这些宗室成员的首选之地。”(《宋史》高宗三、建炎四年“五月乙丑，升高邮军为承州”。以薛庆为“承州、天长军”镇抚使。绍兴三年(1133)三月，“以韩世忠为淮南东路宣抚使。”孝宗隆兴元年(1163)，“张浚进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镇抚使、宣抚使、都督皆为辖区之最高军事首长，专一时之军权、行政权和人事权，成为独立于政事堂和枢密院二府之外的方镇，具有行府之实。薛庆、韩世忠、张浚三人都曾在高邮谋划军事，指挥过对金战争。高沙馆理当成为其行府，至少也是行府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何处高沙馆

宋代的高邮城虽然是军城，但却是一座小城。开宝年间筑城之后，其后的元明清三代，间有修葺，但高邮州城的总体面貌几无变化。隆庆《高邮州志》卷

之一，城池，“邮有新旧二城，今之城宋之旧城也。周围一十里三百一十六步，高二丈五尺，面阔一丈五尺，四围皆有壕塹。”新中国成立后，高邮城墙仍然存在。东起魁星楼护城河一线，西迄镇国寺塔西夹河；南至天桥(南城门)，北及通潮路(北城墙)一线，此即《高邮州志》所说的旧城，也就是宋代高邮州城的范围。依照现在的高邮城区地图量算，高邮城东西与南北长宽约略相当，各为1400米，乃一小小方城。“一州斗大君休笑，国士秦郎此故乡。”杨万里笔下的高邮城，极为真实而贴切。

隆庆《高邮州志》卷十一，古迹，“高沙馆，在州治西南。郡名高沙，以此，今废。”卷之一，“州署在城中少偏东。”“西察院，在州治西，旧名行府。”查明隆庆《高邮州志》州城图，比照今天的高邮城区图，州前大街（今府前街），自东门至西城墙下之教场；南北大街（今中山路），自南门至北门。两条大街将高邮城区分为大致相等的四个部分，高沙馆的位置当在西南区域，也即州志所说的“在州治西南”。南北大街西侧与之并行的市河，河上有桥名南市桥，今名南石桥，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地标。笔者在高邮城区地图上作了量算，沿原高邮县政府（州署）向西，自中市口顺着中山路（南北大街）向南，至南石桥，路程630米；自南石桥沿西塔街（西门大街）向西，至河心岛一线（原西门），距离580米；自南石桥沿中山路至南城门，距离600米。

紧邻南市桥西门大街北侧，为行府。隆庆《高邮州志》卷之一，州属署，“西察院在州治西，旧名行府。有大门三间，二门三楹。内有正堂、后堂、两庑，规制与东察院同，而差狭焉。”“东至弃并民地界，深二十四丈；南至官街，阔十六丈；西至官街，深二十四丈；北至河，阔十六丈二尺。”街坊，“凤凰街，分巷七”；卷之二，桥梁，“凤凰桥，在州西南，乾明寺前。”行府向西至西门，依次为养济院、五圣庙。行府向南，官街与南城牆之间，东为预备仓，今市河仍有桥名南仓桥；西为光孝寺，今名镇国寺。行府向北至州前大街，折向西行，大道北侧依次列有彰孝坊、工部分司、乾明寺、教场。行府的大致位置，对应于今天市河以西，凤凰桥街（凤凰街）以东，西塔街（西门大街）以北，玉带河西延线以南的这一片地区。

这个行府，应当就是行衙，也即高沙馆的所在。

隆庆《高邮州志》，“高沙馆，在州治西南”。行府位于城区的西南部，在大的格局上，与高沙馆的区位完全吻合。

行府的具体位置，亦似为高沙馆量身定做。高沙馆原本就是上级监察部门所在地，既要行监司之责，也要免干扰行政之弊；临近南门，直对陆上驿道；临近西门官河，水路通达，便于于官差的水路出行。行府的位置，完全符合这样的要求，实际上应视其为精心布局的佳作。明清两代的西察院均安排于此，绝非偶然，不单单是对传统惯性的继承，也是合乎逻辑的必然选择。

“旧名行府”，乃是沿引自宋代的制度。行府为宋代在京师外设置的调度军务的机构，有点类似于近现代的军事行营，置罢无常，转徙随时，全视形势的发展需要而定。高沙馆有没有正式充任过行府，今天已经无从确考。但行衙与行府在功能上，的确存在着相当多的交集，以行府称之，并无不妥。再者，以行府代行衙，乃是就高的称谓，这在古人的行文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渡船，曾是我们水网地区农村常见的的一种过河工具。渡船的船体起初是木材做的，后来是水泥钢筋做的，再后来是铁板做的。而时下，随着政府撤渡建桥工程的推进，人们再也难见那终日忙碌而充满生活情趣的渡船了。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村共有六个生产队，每个队有三四百亩田。田块大部分都是以圩子、埭子起名划分的。那圩、那埭周围大多是河沟环抱，水网相连，好似一个个岛屿。人们为了生产和交通的方便就纷纷在河面上设置了渡船。当然，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不搭建桥梁呢？晓得那时集体经济状况的人就会告诉你——就差钱。

渡船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人工撑的，俗称摆渡。就是由生产队在渡口上固定一个人来回撑渡船，本地人自由上下不收钱，由集体支付摆渡人的工分；另一种是拉渡船。人们在渡船的头和梢各装上一个铁环，再在铁环上扣上长长结实的绳子，最后各把两端对应的绳子固定到对岸的木桩上。要过河的人只要拉动一头的绳子渡船就会乖乖地过去，人上船后再拉动另一头的绳子就能悄然地到达对岸。不过，在冬天拉渡船可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儿，手指常要被冰冷的河水冻得像个红萝卜。当然，拉渡船完全是一种个人自助性活动，船是集体的，没人服务，也没人收钱，集体也省了一笔不小的开支。

那时，在乡村，渡口也是一种创收的资源。村与村、乡与乡、甚至与外县连接要道上的渡口集体都得管着。一般一个乡镇往往通往外地的大小渡口就有数十个，不少地方都将这些渡口承包给了个人，渡船一般都是集体的。承包渡口摆渡的人每年都要按规定上缴集体一定数额的钱，剩下的就是自家的收入了。还有地方的渡口因为干部、群众的意见统一不起来，集体无法发包，那就只得依照传统的“抓阄”办法排序，由各家出人连着摆渡。这些连接外地的渡口渡口都必须二十四小时在岗，每逢夜里和雨雪特殊天气摆渡人都要加价，这时想过河的人只求能顺利的过个河，一般都不在乎加多少。

要说这过河钱，其实也不多。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当儿人们过一条三四十米宽的河也只需给四五分钱，甚至还有二三分钱的。如你挑个大担子，带的东西多，空间占大了那你还得自觉地再支付几分钱。当然，在工分制的年代，这三至五分钱也顶得上一分工的价钱了。可见，那时如哪家能包条渡船过河也算是“日进斗金”的有钱人家了。

荡漾在记忆深处的渡船

□ 韩世凯

渡口上的野草枯了又青，青了又枯。弹指间二十多个春秋已过，但对于过去那荡漾在乡村大小渡口上的渡船我还有一种挥之不去、似乎还发生在眼前的真情记忆。我也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深秋的哪一天的傍晚。那天，我跟着生产队里的一大群收工的男女劳力火急急的上了渡船。上船的人们个个身上都背着鼓鼓的草夹，当时有人提醒大家船小要少上些人。但，归心似箭的人们谁也没听进去。就在船还离岸丈把远的当儿，突然一个妇女被不知从哪蹦出来的一只田鸡给吓着了。她一边惊叫着一边闪躲着身子。渡船上的人一下子全被直晃的渡船吓慌了，船一下子歪了，进水了。继而，船猛的倾向一边，翻了。船翻了，船上的人全被下了饺子纷纷落入河中发出阵阵大呼怪叫。我和几个会舞水的男女劳力立即扎猛子紧急把几个不会舞水的“秤砣”都捞上了岸。那大姑娘阿香是最后一个给捞上来的。捞到的时候，她沉在水里已喝足了河底的浑浆水，人已经昏迷过去了。只见大劳力邢大个子立即牵来附近田头上的一条老牛，飞快地将阿香面朝下地放到牛背上挤压。昏迷中的阿香被凸起的牛背顶着腹部，不一会儿“哗、哗、哗”的几声便把喝进肚里的水全呕了出来。接着，大伙儿又七手八脚地把她平放到田埂上一会儿压胸，一会儿掐人中穴。阿香醒了，被救活了，大家高兴得鼻涕直流，眼泪直掉。我顾不上自己个子矮、力气小，背起邢大个子的草夹子就奔。邢大个子背着阿香直往村里跑，一直送到她家。没过年把，阿香嫁给了邢大个子，尽管邢大个子家中很穷很穷。

前几天，我带着孩子到老家踏青。我下意识地去了一趟邢大个子救阿香的那个渡口。河面上渡船不在了，早已架起了一座宽宽的、长长的水泥桥。桥身上不仅全刷上了洁白的涂料，而且两侧都装上了结实的栏杆。桥头堡上“平安桥”三个字被大红油漆描得异常醒目，在温暖的春光里让人看后顿觉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

我伫立桥头良久良久，田野里飘荡着的绿草芳香让我的思绪飞得好高、好远。忽儿，这撩人的思绪又变成了一只翻飞在春天里的紫燕飞落到曾经忙碌的渡口，如今的“平安桥”上。

朦胧间，我仿佛又看到了邢大个子和阿香他们朴实而勤劳的身影。

入党

□ 张纯玉

他从战争年代讲到和平建设时期，有在火线入党的，有在和平年代抢险救灾中入党的，有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贡献入党的。他说我入伍虽不到一年时间，但能正确对待革命分工，热爱本职工作，安心高原，不怕条件艰苦，以部队为家，平时助人为乐，为连队和当地群众常做好事，夜间替老兵、病号兵站岗放哨，经常放弃休息时间为连队出黑板报，办宣传专栏，为弘扬连队正气做出了努力，还为部队驻地困难群众捐衣捐款不留名。什么叫入党条件，这些表现就是入党必备的条件。因此，在发展党员的问题上，不论兵龄长短，不凭资历深浅，不增附加条件，不设条条框框，不带感情用事，严格按党章要求来，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教导员的一席话说服了所有人，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后经连队党支部再次研究，全票通过我加入党组织，待上级党委批准。

时隔几日，教导员找我谈话，他要求我要正确对待荣誉，正确对待党组织批与不批一个样，若组织批准我加入党组织，他要我谦虚谨慎，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端正入党动机，把加入党组织作为奋发努力工作的加油站，要克服船到码头车到站的不良想法，要继续为连队为大家服务，牢固树立真正从思想上入党。若组织暂不批准我入党，说明我还有差距。他要我正确对待，从自身上找差距，不要怨天尤人，要继续努力工作，不断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千万不能泄气，打退堂鼓，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尽快加入党组织。

我把教导员的一席话一直作为工作的奋斗目标。

孟城驿

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